

顾颉刚致罗根泽信札十通

刘雪平

内容摘要:湖南图书馆藏有顾颉刚致罗根泽亲笔信函十通,写作年代大致为1932年至1935年间。信札中顾颉刚就《古史辨》的选题内容、编篡体例、校稿审核、出版发行、经费来源等诸多细节与罗根泽往复讨论,如是否选入章太炎、胡适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,是否摘抄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蔡元培《中国伦理学史》等书中有关诸子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等等,既表明顾颉刚先生《古史辨》编篡中重视鉴别和吸收晚近兴起的哲学、史学、社会学新知识理论的现代性史学思想,也反映出国难当头、时局纷扰下学者苦心孤诣,延续学术文脉的勇气和艰难情形。

关键词:顾颉刚 罗根泽 古史辨

湖南图书馆藏有顾颉刚致罗根泽^①亲笔信函十通,写作年代大致为1932年至1935年间。1932年1月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根泽将所编《诸子丛考》交给顾颉刚审阅。顾颉刚曰,该书“起自唐代,迄于今日,凡辩论诸子书的年代和真伪的文字都搜罗于一集……我见了,触动了我的宿愿,就请求他编列为《古史辨》的第四册”。^②当时国难当头,顾颉刚先生为宣传抗日而日夜奔波,既要编抗日的“通俗读物”,同时要办《禹贡》半月刊,无暇顾及《古史辨》,而罗根泽恰巧致力于诸子学的研究,编辑《诸子丛考》的体例与《古史辨》相类,因此顾颉刚邀请罗根泽来主编《古史辨》第四册。第四册是当时讨论儒、墨、道、法家的文章的总汇,1933年3月由朴社出版,罗根泽在《自序》中说道:“这本书的编印,最感激的为顾颉刚先生……编辑方面,校勘方面,他帮忙的地方也非

①罗根泽(1900-1960),字漱冰,号雨亭,河北深州市人。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、燕京大学中国研究所。历任河南大学、天津女子师范学院、北京中国大学、民国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西安城固西北联合大学、重庆中央大学、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教授。解放后,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。著有《隋唐文学批评史》、《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》、《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》、《诸子考索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》、《孟子传论》、《管子探源》等。

②顾潮编著:《顾颉刚年谱》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224页。

常之多,实在令我铭感无极。”^①本文意在从顾颉刚致罗根泽的十通亲笔信札中,梳理和分析有关《古史辨》编纂的真实史实,挖掘顾颉刚丰富的史学思想,感受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学者的爱国情怀和学术追求。

—

雨亭先生大鉴:

弟以前承赐书,敬悉。弟到沪之日以时局紧张,未敢多留。及到杭而闻此变作,至今半月,遭靡烂甚矣。家父以时局危险,劝令缓行,因暂止于此,大约须春假前后返平矣。

前编《古史辨》第四册,想已脱稿。但时局如此,《古史辨》第三册销路未必佳。如第三册初版不能销完,则本钱亦不能收回,第四册无以付印。但望沪上我军大胜,使日人戢其淫威,北平教育费有着落,可继续开学,则第四册不难于短时期内付印也。恐承垂念,敬此奉闻。总之,只要景山书社不倒,此书决能付印,惟时间先后则不得不视时局而定耳。乞暂待之,是感。

匆上,即请著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廿一,二,十三

据《顾颉刚年谱》,顾颉刚1932年“一月二十一日,离平赴杭探亲……二十七日,抵沪。二十八日,抵杭;该日发生‘一·二八’抗战,交通阻隔,以此滞留杭州四个月,此期间两校功课请唐兰代”,则此信写于1932年2月13日。是年顾颉刚任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,北京大学史学系兼课讲师,主讲《尚书》研究,所以信中才写到希望我军胜利,如此北京教育费才有着落,可继续开学,这样有资金用来编印《古史辨》。

信中所提及的景山书社乃是朴社的门店。1925年,顾颉刚提议,朴社钱积了一年,可以开一个小书店了。于是朴社在景山东街十七号(马神庙)租房备开门市部,名景山书社。11月9日,景山书社招考伙友,录取冯世五等;十五日,景山书社开业。顾颉刚编的《古史辨》就是在这里出版的,销路不错。抗战之后,景山书社并入开明书店。

二

雨亭先生:

上旬接赐书,至快。尊编《诸子丛考目》,捧读之下,觉材料详赡,钦佩无量。断自清代甚好。清代以前皆断片之见解。或大作序文中,汇合举之可已。嘱作序文,自当勉为之。

朴社来函,悉近日营业不佳。《古史辨》第三册出版后,发出不过一

^①顾潮编著:《顾颉刚年谱》,第233页。

半，书价能收回多少亦殊无把握。闻之愁绝。现在这时代不是研究学问的时代，奈何之！大作只得俟时局稍安定后再以付印，不安之至，乞谅解之！

适之先生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，为对于诸子观念之一大改变，似可录入《总考》中。又彼与章太炎先生讨论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数函，似在《文存》三集中，请一检，有录入需要否？袁枚文集中有《论语辨》数篇，论《论语》齐鲁本之混合，甚善。范家相^①有《家语证伪》，在《式训堂丛书》二集中，不知有可抄之序跋否。近年论《老子》者皆由任公驳适之先生书而起，则《哲学史大纲》中似当抄出一段，置于任公先生文之前（如体例不收专书，则可用六号字排在梁文之前）。钱穆先生发表《老子成书年代》一文后，适之先生曾致函驳之，此文未发表，可往抄之（钱先生住后门内二道桥二号）。近年之论杨朱者，大都由蔡子民先生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中疑为庄周而起，则《伦理学史》（商务出版）亦当摘抄。管见如此，未知有当否？乞审核是幸。

弟以家父在此，年虽不甚高而非龙钟特甚。深恐战事扩大，杭州糜烂，故不敢舍而此行。近日日军继续与我以压迫，非决心抵抗不可。如中华民族得因此一战而重兴，则江浙两省虽遭牺牲，亦是值得。弟读子书，常觉战国人之精神与勇气不可及。先生有暇，兹抄出其书，加以贯串，为中学生读物，实亦唤起民族精神之一道也。

匆上，敬请著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廿一，三，十一。

晚清诸子学的研究是当时一大热点，罗根泽的《诸子丛考》原搜罗了唐代迄于民国凡辩论诸子书的年代和真伪的文字，计二百余篇，编列为一册，然而篇幅太多，罗根泽就把自己及旁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，清代以上的文字删掉，留下名家和阴阳家等问题。顾颉刚赞同此法，认为“断自清代甚好”，最终《古史辨》第四册的编纂采选了民国十馀年来的讨论文字，如胡适、唐钺、钱玄同、刘盼遂、钱穆、张西堂、余嘉锡等人的诸子研究。

信中又说：“适之先生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，为对于诸子观念之一大改变。”顾颉刚对胡适的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这篇文章评价颇高，认为“自读此篇，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，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。”^②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，梁启超发表“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”的意见，又让顾颉刚的观念一新。他认为罗根泽把这两篇放在第四册上、下编的开头，是非常正确的，“本册中容纳的四十余万言的讨论，恐怕大部分都是从这两篇引起。如果没有这两篇，时代的飓风固然也终于吹散这堆浮云，但总要慢一些了。”^③关于

①范家相，字左南，号蘅洲，浙江会稽人。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历官刑部主事、郎中、柳州知府，著有《环渌轩诗钞》、《三家诗拾遗》、《诗沈》、《古趣亭未定稿》等。

②罗根泽编：《古史辨》（第四册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7页。

③罗根泽编：《古史辨》（第四册）第17页。

《老子的成书年代》，当时的学术界争论不休，胡适认为《老子》一定是《论语》以前的书，不料梁启超提出反驳，以为《老子》必是战国时的书，即信中提到的“近年论《老子》者皆由任公驳适之先生书而起”。而顾颉刚赞同梁说，取《吕氏春秋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证之，“我前读《吕氏春秋》，见其中多用《老子》词语，但未尝一称‘老子曰’或‘《道德经》曰’，曾疑此等语都是当时习用的词语，含有成语及谚语的性质的，到了作《老子》时乃结集在这部书里。”^①顾认为老子生于战国中叶，《老子》之书出于战国后期，其发展则在西汉初期。后胡适见此文，作《评论近人考据〈老子〉年代的方法》进行反驳。

《古史辨》第四册中采选了大量的诸子研究文字，其下编还刊登了胡适致钱穆的信函及驳文《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》。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，出现了胡适和章太炎治诸子之争，章太炎和胡适先生分别抛出“提倡国学”和“整理国故”的学术观点，同治国学，但治经治子的方法却有根本不同。章太炎突破清学之囿，主张区分经学与子学的不同路径，而胡适则继承清儒的治学遗风，突出系统的整理，强调各学科的共同科学方法，这反映出两代学者学术背景、学术思路的诸多不同。1909年9月，章太炎发表了《致国粹学报社书》，论治小学及诸子学之门径。他以探讨“真理为归宿”来定位诸子学研究，从而挑明了与清儒治诸子学门径的根本区别，即一重音韵训诂，一重义理之阐发。章太炎认为，经多陈事实，说经用在考迹异同、发明历史真相，诸子多明义理，其要在寻求义理，陈说人生奥秘，乃“客观之学”与“主观之学”之别，治子与说经方法有异。1917年4月，胡适在《太平洋》第1卷第7号上发表他诸子学研究的处女作《诸子不出王官论》。围绕着诸子学研究的诸多问题，章、胡之间展开了反复辩难。1922、1923年，章太炎借《致柳翼谋书》、《与章行严论墨学书》等批评胡适，而胡也致信章士钊进行反驳：“经与子同为古书，治之之法只有一途，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，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订。”而钱穆、顾颉刚、蔡元培等人则大力表彰胡适《诸子不出王官论》的“现代意义”，肯定胡适方法论层面的“范式革新”意义。顾颉刚虽然承认“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”，但却终究认为“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画”^②。于是在该信中顾颉刚提出建议，即“彼与章太炎先生讨论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数函”是否有录入的需要，后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日的信中，顾颉刚认为“胡、章论治子方法”确不必登，因而第四册最终未刊登胡、章之间的往来信函。

信中提及的朴社是中国现代史上创办较为成功的一家出版机构。而早在1922年，顾颉刚因祖母病重，曾回原籍苏州照料，被商务印书馆招进编辑中小

^①顾潮编著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第225页。

^②顾颉刚：《走在历史的路上——顾颉刚自述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84页。

学教科书。一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茅盾、周予同、郑振铎、叶圣陶等人，交往密切，天天见面。1923年1月初，郑振铎在聚会的时候发言道：“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，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，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，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，我们太吃亏了。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，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。”几天后（即1923年1月6日）就结合了一个团体，由周予同起名，定为朴社；推顾颉刚为总干事，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，作为公积存入银行生息。1924年，为避难，在沪同仁欲收回存款，决定解散朴社，顾颉刚重新组织，召集范文澜、冯友兰、蒋中川、俞平伯、朱自清等人加入，继续维持朴社，编印书籍多种。朴社经营至1937年12月结束^①。

三

雨亭先生：

顷接赐书，敬悉一切。《古史辨》出版事，已函朴社经理何殿英先生，嘱其趋前接洽。如彼见即以付印，最好。如可，即付印，校对请先生自为之。最好校稿三次，方可使误字较少也。尊著既列为第四册，自以与第一二三册同地出版为宜也。接洽结果，便乞示知是幸（何先生住西长安街真光摄影社内）。

拙作“论墨子”一段，太简单，且无甚新义，以不录入为宜。胡先生“论别墨”一段，自应录入。陶方琦^②《文子非古书说》一文，居然觅到，闻之快甚。陶先生死得太早，著书未成者多，其研究《淮南》最深，未知将来能觅得其残稿否。

匆覆，敬请著安。

弟颉刚上。廿一，三，廿四。

据《顾颉刚日记》：“三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看《要籍解题》，毕。写何殿英，罗雨亭信，为印《古史辨》第四册事，即到城站寄发。”^③当为此信。信中提及的“胡先生”当为胡适，《古史辨》第四册的编纂遵从了顾颉刚先生的建议，上编录入了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第八篇第一章中“墨辩与别墨”一段。

^①顾颉刚：《顾颉刚自传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25页。

^②陶方琦(1845-1884)，字子缜，一作子珍，号湘湄，一号兰当，谱名孝邈，浙江绍兴人，李慈铭高足。清光绪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督学湖南。年四十，卒于京邸。方琦学有本末，汲汲于古，述造无间岁时。治《易》郑注、《诗鲁故》、《尔雅》汉注，又习《大戴礼记》。其治淮南王书，力以推究经训，搜采许注，拾补高诱。再三属草，矻矻十年，实事求是。著有《淮南许注异同诂》、《许君年表》、《汉孳室文钞》等。

^③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二，中华书局2011年，第622页。

四

雨亭先生：

前日一函，谅览悉。顷想起两事，特奉告。

其一，钱宾四先生对于诸子研究甚深，创见甚多，本集亦收入其文数篇，可请他在暑假中作一序文。未知先生已与他会晤否？

其二，《古史辨》向例在封面囊页有一插图，兹编诸子，似可用《孔子见老子》之汉画像（石在济宁州学，北平当有旧拓本可得）。未知尊意以为然否？

玄同先生，近日常晤否？渠对于本集有何意见？为念。

何殿英先生，想已到府接洽过。结果如何？朴社可印，总以该社出版为宜。

刚近作一文，名《从〈吕氏春秋〉考定〈老子〉之成书时代》。大意谓当吕书著作时，《老子》一书尚未凝固，故其所引《老子》语不名之曰《老子》，或曰《道德经》，而名之曰《诗》，或云《故曰》，与引谚相同，可知老子之语为当时所习用，而其书则至汉初而始定也（以《淮南子》与吕氏书相较，即可知）。此文成后，即寄登《燕京学报》。届时请指正。将来如能录入《诸子丛考》之第二集为幸。

匆上，敬请著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廿一，三，廿七。

信中提及的“钱宾四”，即钱穆先生。他为古史辨第四册作序，称“罗顾两先生并约余为书作序，余积年考订诸子，虽粗有所获，具详系年，其书未出，无所借以请教。因偶摘余书中论儒墨一义，报两君之雅命焉。”^①

又，信中所言“刚近作一文，名《从〈吕氏春秋〉考定〈老子〉之成书时代》”，据《顾颉刚年谱》上记载：四月 作《从〈吕氏春秋〉考定〈老子〉之成书时代》，刊《史学年报》第一卷第四期（是年6月30日），从此信知此文之作早于四月，刊入《古史辨》第四册，发表时改名为《从〈吕氏春秋〉推测〈老子〉之成书年代》。

五

雨亭先生赐鉴：

读两示，敬悉一切。尊编即可付印，闻之至慰。承示之事，条答如下：

（1）拙编墨子年代，太单简，又无心得。曩出《古史辨》数编，材料甚

^①罗根泽编著：《古史辨》（第四册），第4页。

杂，即一短函亦可刊登。兹编多精心结撰之作，以拙作厕入，徒然相形见绌。还是等待编第二集时，再由弟作成一文刊入罢。

(2)胡、章“论治子方法”确不必登。弟当时未详思耳。

(3)《燕京学报》虽无版权问题，拟以两年后再转载为宜，否则将令人攻击，谓弟此文实为《古史辨》而作者。好在尊编出版，讨论诸子之风必大起，二年之后，再集三十余万言并不为难。弟文再收录，不迟也。

(4)宾四处，俟去函时当嘱其作序。

(5)除去乾嘉前后人作品，弟亦赞成，以时代较远，和我们的意识已不甚合也，惟清末人之作品则不必除去。尊意以为如何？再所删部分，仍请编为一册，在《辨伪丛刊》中出版。弟当时宗旨，以《古史辨》印近人文字，以《辨伪丛刊》印昔人文字。如承允可，无任感幸。且此二册如同时出版，则购书者必并购之者也。且《辨伪丛刊》为小册，出版较便。弟意，可收唐宋元明人辨诸子者出一册（如材料多则分为二册），清代人辨诸子者又出一册。今兹将此一部分取出，则第二册稿已全，但辑第一册可已。如此，与玄同先生之意见亦甚合。未识尊意以为然否？本文卅二三万言，恰好，以加上序文则仍为卅五万言也。乞赐！

承示编辑高中国文课本宗旨，弟极以为然。惟中国文学，感伤者多，发皇者少，弟八年前在商务编教科时，即感到适当材料搜集之难。未审有同感否？

匆上，即请著安。

弟顾颉刚上，廿一，四，十二。

顾颉刚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二号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出，同至三忠祠看浙江图书馆所藏版片。归，修改上午所作。写罗雨亭，何殿英信。”应该就是这封信的内容。

早在民国九年，顾颉刚就和胡适计划《辨伪丛刊》，即着手编点《古今伪书考》，“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……”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，正可接受了他们的遗产，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”^①。就在这时，顾又结识了钱玄同，认为“这‘辨伪’的一个意思，竟与先生宗旨不谋而同，快极”。三人书信往来频繁，其目标也从辨“伪书”转移到辨“伪史”上。《辨伪丛刊》在1926年至1935年间共出版了2辑12种，集中整理了一些重要的疑古辨伪的著作和言论，可与七册《古史辨》交相辉映。

^①顾潮编著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第57页。

六

雨亭先生：

顷接手示，敬悉一切。尊辑已付印，甚为快慰。宾四先生处，昨已去函，请其于暑假中作序矣。

大作《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》编入胡先生文后，极好。钱先生有未发表之文数篇加入，更快。大作《庄子复始》，未知《清华学报》已表示接受否？为念。如先在清华发表，将来收入第二册，甚好。弟所作《从〈吕氏春秋〉推测〈老子〉之成书年代》一文，已于四日前寄容先生，凡三万言。是则第二册之材料已有七万言矣。更历二年，搜辑廿餘万言，实非难事。

先生下学年职务，自当尽力。清华国文系主任，下学年如仍由朱佩弦先生^①担任，弟当容易进言，否则与刘叔雅先生^②不相识，只得托冯世五先生代言之耳。内政部长既发表黄绍竑^③，则朱家骅^④当续任教长，联带章及适之先生，不至任北大校长矣。辅仁空气如此，可为一叹。

国文教科，弟在商务馆所选，不及一年而成六册，自觉过于潦草。承奖，至愧。将来有暇，当谋补过也。

匆上，敬请著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廿一，四，廿六。

信中“弟所作《从〈吕氏春秋〉推测〈老子〉之成书年代》一文，已于四日前寄容先生，凡三万言”，此处容先生当指容庚。据《顾颉刚年谱》记载，四月廿二号“写希白、八爱信。此文实作十日，得三万言。自今日以上五天，为予全神贯注于《老子》一文之时，其他任何事都未做。四月廿三日，寄所作文。”^⑤

1922年夏，顾颉刚祖母去世，因办理丧葬事宜，未回北大申请停薪留职。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，招顾担任编辑国文、历史两种。出于顾家的考虑，12月3日，顾颉刚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，与沈雁冰、郑振铎、叶圣陶、周予同等人共事，与王伯祥合编成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》上、中、下三册，与叶圣陶合编《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》。后来这些人共同努力，成立了朴社。

①朱佩弦即朱自清。

②刘文典（1889-1958），原名文聪，字叔雅，笔名刘天民。安徽合肥人，原籍安徽怀宁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国立安徽大学校长、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。1938年至昆明，先后在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任教。著有《淮南鸿烈集解》、《庄子补正》、《三余杂记》等。

③黄绍竑（1895-1966），字季宽，广西容县人。新桂系创建人，桂系三巨头之一，历任第7军党代表，广西省主席，15军军长，湖北省，浙江省主席，内政部长等要职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民革中央常委等职。

④朱家骅（1893-1963），字骝先，湘麟，浙江湖州人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，担当过教育、学术、政府、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，曾是中统负责人。

⑤顾潮编著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第630页。

第二年教科书编竣，顾颉刚回到了北大。

七

雨亭先生：

《古史辨》第四册序文刻已撰成，兹送上，请审核。阅后即付印刷局为荷。此文弟所以如此做，实以此数年中时局无开云之望，此册出后未知能否再出，为向后人叮咛，不得不尔也。如我辈尚能为全，景山书社尚能敷衍，则每年一册，必不使停，诸子问题，幸先生始终之。

匆上，敬颂著祺，并请俚安。

弟顾颉刚顿。二月十二日。

据《顾颉刚年谱》记载，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：“为罗根泽所编著之《古史辨》第四册作序。”^①推测此信当作于1933年。又《顾颉刚日记》，二月十二号星期日：将《古史辨》序作毕……此序作了一星期，得一万四千言。迩来少作长文，得此精神一振。本寒假中以病未多做事，此乃惟一之成绩。^②

八

雨亭先生：

久不晤，为念。拙著《州与岳的演变》一文新出版，兹敬奉上，乞审正。另册乞转交盼遂^③先生为感。

通俗读物编刊社，系弟等所创办，志在切实开通民众智识，今正募捐。民大方面，如承代募，无任感荷。兹奉上捐簿单，乞检收。

匆上，即请潭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十二月十一日。

从《日记》1933年8月21号“上午二时起，校《州与岳的演变》”^④和9月4号“予到北大考试。树民，向奎来谈。三时试，五时半出。在试场校改《州与岳的演变》一文”^⑤等记载可知，《州与岳的演变》一文作于1933年。又该信中涉及“通俗读物编刊社”一事，可推断该信约写于1933年12月11日。《州与岳的演变》一文发表于1933年8月的《史学年报》第五期，又刊于1934年3月《方志月刊》第七卷第三期。

①顾潮编著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第230页。

②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，第14页。

③刘盼遂（1896—1966），名铭志，字盼遂，师从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等人，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古典文献学家、语言学家。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、河南大学、燕京大学、辅仁大学。19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。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目录等方面造诣精深，著有《文字音韵学论丛》、《段王学五种》、《论衡集解》等著作。

④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79页。

⑤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84页。

办通俗读物编刊社是顾颉刚倾尽心力从事民众教育工作的写照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燕京大学师生感觉时局危急,都组织抗日会,推举顾颉刚任宣传工作。他用大鼓书词编撰了大量抗日通俗读物,销路很广。这些书以“三户书社”名义出版,取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之意。后又觉得灌输民众知识,单是抗日还不够,必须兼及农工业及医药卫生等项,所以扩大范围,1933年10月,“三户书社”易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。10月13日,《通俗读物编刊社章程》于《燕京大学校刊》第六卷第七期《校务纪闻》刊出,其目标除提倡民族精神外,尤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。该社因燕京大学教职员不愿再扣工资而为先生所独办。后该社迁到绥远、西安、汉口、重庆等地,1940年停办。

九(图见封二)

雨亭先生:

接诵赐书,敬悉已到安大任教(尊眷均同往否),从此得以安心读书,无东奔西跑之苦,闻之至以为慰。现在已开课,未知学生程度如何?教课有兴味否?甚念。

家母之丧,承蒙惠赐赙仪,至感。弟正游览绥远,缘遭此变,精神痛苦之甚。苏州是繁文缛节最多之处,孝子直是被弄之猴,天气又热,苦死矣。今随侍家父来杭,约十一月中回平。

周先生处,已照尊意去函。民院方面,西堂事成功否,为念。

《禹贡》半月刊,至新作文,藉增光宠。如能代销或介绍定售,更感,有事请直接通知弟宗冯世五君。稿则寄杭。

匆上,敬请著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廿三,九,廿一。

1934年秋,原执教于北平师范大学的罗根泽赴安庆,任教于安徽大学,直至1935年夏,顾颉刚先生挂念其任教情况,信中问询再三。1935年,罗根泽仍回北平师范大学,并开始《古史辨》第六册的编纂。

据《日记》记载:九月廿一号,写予同、根泽、绍虞、葛毅卿、陶希圣、陈延进、余让之信。“写根泽信”,当应为该信内容。《日记》又载,顾颉刚1934年8月9号到达绥远。8月17号与王靖国等友人共去包头,且游五原。忽得家电,继母病笃,只得回家。8月18号到清华园站,雇车归,知继母已于前日酉时逝世。

信中所提及的“西堂”,即张西堂(1901-1960),本名张正,字西堂。祖籍湖北汉川,生于湖北武昌。先后任孔教大学、河北大学、中国大学、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。1931年到1934年,经顾颉刚介绍推荐,赴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和河南大学任教。1934年8月回到北平,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、民国大学、中国大学教授,并参加了《中华大辞典》的编纂工作。著有《春秋六论》、《谷梁真伪考》、《王船山学谱》、《荀子真伪考》、《公孙龙子研究》、《周秦诸子论丛》、《孙卿子考证》等。

张西堂与顾颉刚学术兴趣接近，交往甚密，顾颉刚计划编一套“辨伪丛书”，特意请张撰写了《唐人辨伪集语》。其日记卷三 1934 年 1 月 15 号记道：“张西堂来，留饭，为写孟真信。”^① 5 月 9 号：“到新陆春赴宴，七时许吃饭未毕，雇人力车归”^②，同席者就有张西堂。1935 年 9 月 4 号：“到西堂处。”5 号：“到西堂处，彼尚未起……校《唐人辨伪集语》。”^③《年谱》1933 年 5 月载：“校《左氏春秋考证》中张西堂《序》、钱玄同《书后》。”^④可见张与顾两人学术交流频繁，私交甚笃。

“民院方面，西堂事成功否”当指顾颉刚介绍张西堂去民国大学任教，不知民国大学是否聘任，结果未知。

十

雨亭学兄足下：

累接大札，均以事耽搁，歉仄之情无言可表。弟入世较久，人事日繁，无一日无意外之事，在北平已无读书之望，旋南亦复如此。每念前途，惆怅欲绝。《古史辨》第五册已出版，嘱平中送上，不识已收到否，乞赐评正是荷。第六册集稿如何，为念。便乞开一论文名单见示是幸。

来书所道燕京之事，弟虽在委员会中，亦不便提出，所以然者，弟本非国文系中人，而此次居然到了国文系审议委员会，为去郑之负责任者，坐是为对方所深怨，为旁人所侧目，弟虽绝无垄断之心，而外间推测则尽指为弟扩张地盘，其实弟如有找地盘之心，则当年何必入燕京？当年别人与以地盘而不受，今乃争此小区区乎？以此知求人谅解实至难事，为稍解人误会，惟有不介绍人之一法，好在弟常以南行，正可付之不见不闻也。兄要回北平服务，弟当成此志，惟乞稍假以时日，并沉于此数年中努力著作，使弟易于说项。然著作不在量而在质，故不望有大量生产，但望有六七篇结实之论文，唤起学术界之注意耳。前月承寄《诸子与地理关系》一文，弟读之数过，觉其与地理关系过少，不适于登《禹贡》。用是未能发表，俟弟回平当寄上也。其实文哲方面之问题可作地理统计表者甚多（如各史《儒林传》、《文苑传》等皆可作），且不必自己作，可令学生作之，但求脚踏实地，则虽无理论而自然成文，未知能办到否？又《禹贡》经费赖弟捐薪，现在弟不常在平，此事颇有问题，如能多招会员及定户，则经济可望独立，未知兄能代为罗致否？前日手书，嘱撰名人传记，此事久在弟熟想之中，总以无时间为之，终未能如愿，弟现在要作一五千字之论文，已大困难。去冬到

①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 150 页。

②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 187 页。

③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 386 页。

④顾颉刚：《顾颉刚全集·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 235 页。

平两月,仅成《古史辨》第五册自序及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》两文耳。然未晓而起,深更而眠,至心脏病大发,不能执笔而止,身体薄弱如此,更不必说做什么做什么矣,愿谅之。

匆上,敬请俪安。

弟顾颉刚上。廿四,二,廿八。

顷以事来苏,三日后即返杭,又及。

据《罗根泽先生年谱简编》,1935年3月初,得顾颉刚自苏州所寄信。而《顾颉刚日记》也记载:“写杨昭恕、雨亭、昌群、海波、朝阳信。”^①时年春夏间,罗根泽尚在安庆,任教安徽大学,并开始编纂《诸子续考》,即《古史辨》第六册。

“而此次居然到了国文系审议委员会,为去郑之负责任者,坐是为对方所深怨,为旁人所侧目”,此事《自传》和《年谱》均有记载。据《自传》:“进入燕京大学,起初几年很好……一经学生的拥护,事情既忙,学校当局就另眼看待,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。例如‘郑振铎解聘事件’,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,因为他作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错误太多,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,登在报上,妨了校誉,所以要辞退他。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,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,形势汹汹,工作停顿,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,组织一个‘国文系审议委员会’处理此事。”^②“先生曰:‘予非国文系人而加入此会,必为人所攻击,然他们本要我作挡箭牌……为公家着想,只要办得好,即个人结些怨家亦复值得。’次年一月,执委员议决,郑振铎以研究工作的名义,下学期即离校。闻宥准其辞职,下学年离校。”^③

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,学者欲纯粹专注学术研究困难重重,如信中所说“现在这时代不是研究学问的时代,奈何之”,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摆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前。1934年2月,顾颉刚集合学生和同事、朋友,筹备组建禹贡学会,创办了《禹贡》半月刊,在《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》中明确指出:“救国之道千端万绪,而致力于地理,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,进而谋改造之方术。”并制定了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”,为挽救民族危机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。顾颉刚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显著,他主张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均整理出来,作各种专题研究,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,谋民族自救之方,如提议罗根泽等人,“其实文哲方面之问题可作地理统计表者甚多(如各史《儒林传》、《文苑传》等皆可作)”。《禹贡》半月刊在顾颉刚先生的捐款和会员的会费等支持下,办得有声有色,共出版七卷八十二期,发表文章七百余篇,内容涉及历代史

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:《罗根泽文存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436页。

②顾颉刚:《顾颉刚自传》,第108页。

③顾潮编著:《顾颉刚年谱》,第256页。

地、本国地志、民族和宗教、中外关系、地理书籍等方面,并培养了大量的地理类专业研究人才,中国现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,在顾颉刚的倡导下开展起来。

信中又言“然未晓而起,深更而眠,至心脏病大发,不能执笔而止,身体薄弱如此,更不必说做什么做什么矣,愿谅之”,据《日记》1935年1月4号记载:终日卧床,欲览书,目酸而止……予之疾显然为一月来过劳所致。但天下事必须如此才能做好,予不悔也”。1月5号记载:“终日卧床,上午眼酸不能张,下午渐愈……刘玉山为延医,叹曰:‘先生,你太用功了,致生此病。’”2月25号记载:“晚饭后腹痛甚,眠后又起泄,大半夜未眠。”可见,顾颉刚近年来辛苦工作和奔波,身体已积劳成疾。

顾颉刚从疑古辨伪的角度来开展对旧古史系统的全面研究,追寻“历史的真相”,使得真的商、周回复其商、周的地位,假的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回复其先秦或汉、魏的地位。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,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慢慢从“重致知”转到“致知和致用并重”,他的历史研究也开始注重考虑如何挽救民族危机,更积极参与抗日,“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,从此以后,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,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,我要学范仲淹‘以天下为己任’了。”^①他深感唤起民族精神、号召民众一起抗日的重要性,非常重视通俗文学教育民众的作用,他认为“我们有知识的人,此时应教育大众,与大众发生关系”^②,抗日宣传应该用民众的词汇、语句,来迎合他们的趣味。早在“五卅惨案”发生时,顾颉刚使用民歌形式在《歌谣周刊》上发表传单,后开办通俗读物编刊社,用民众熟悉的鼓词、弹词、连环画、歌谣等形式,创作和出版大量的通俗读物,指导和鼓励大众抗日,与民众结合得相当紧密,如信中与罗根泽提及,“弟读子书,常觉战国人之精神与勇气不可及。先生有暇,兹抄出其书,加以贯串,为中学生读物,实亦唤起民族精神之一道也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刘雪平,女,湖南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古文献整理与研究。

^①顾颉刚:《顾颉刚自传》,第71页。

^②顾潮编著:《顾颉刚年谱》,第279页。

